



一座城市景点再多,若缺乏贯通其中的文化主线,也难以形成完整而鲜明的城市气质。文化的力量,从来不在于要素的简单堆积,而在于整体的结构生成。

零散景点简单叠加不等于城市文旅IP

孙鹏飞

当前,城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竞相开发文旅资源、塑造城市形象,成绩有目共睹。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地方宣传点位星罗棋布,主题各自独立,景点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看似资源丰富,实则“有珍珠、无项链”。

这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普遍性。有的地方追求多点开花,景点数量不少,但相互之间呼应不足,游客体验容易失之零散。有的地方点位各具主题,整体叙事不够清晰,资源合力有待增强。有的地方文化表达偏重形式,对内涵的挖掘提炼还不够深,给人留下“有看头、少回味”的

印象。应当看到,这些多是文旅快速发展阶段的探索性问题。各地发展的积极性值得肯定,资源家底也很厚实,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文化主线的提炼与统筹,推动文旅融合迈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

文化主线的深层功能在于建构认同。一座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一个民族需要有民族精神,一个城市同样需要有城市精神。城市精神不是凭空喊出的口号,而是需要从城市历史文脉中萃取,经由文化叙事熔铸。对于一些城市而言,游客记住的不是某个孤立景点,而是一种完整

的城市气质。反观“千城一面”者,景点不可谓不多,却因缺少主线而印象不深。有无文化主线,分野正在于此。城市文旅IP是城市文旅资源经提炼整合而形成的整体形象与价值表达。一首乐曲音符再多,若没有主旋律,便难以动人。同样,一座城市景点再多,若缺乏贯通其中的文化主线,也难以形成完整而鲜明的城市气质。文化的力量从来不在于要素的简单堆积,而在于整体的结构生成。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个“活”字,靠的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提炼功

夫,而非简单陈列。

破解“散”与“碎”需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要做好提炼的减法,敢于聚焦、敢于舍弃,从历史脉络、地理禀赋、人文气质中萃取最具辨识度的文化主线。二要做好整合的乘法,推动景点、街区、非遗、演艺等各类要素围绕主线协同联动,让游客无论走到哪个点位,感受到的都是同一座城市的延续与展开。三是表达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善于借助新媒介、新场景、新空间讲好城市故事,从而让城市文化IP立得住、传得开、走得远,真正做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作者单位：中国旅游研究院）

根植乡土 融通当代：

论二十四节气作为人类非遗的文化生命力

王思远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在实践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涵盖天文、物候、农事、人文等层面。2016年,它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列入名录并非终点,而是考验文化生命力的新起点。在城镇化加速、数字技术渗透的当代,二十四节气如何持续生长、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意义,是值得探讨的文化命题。

节气之源：二十四节气的农耕文明根基

二十四节气源于黄河流域数千年农耕文明实践。中国先民观天察地,总结出以太阳运行规律为核心的时间划分体系,将一年分为二十四等分节点,每个节气对应特定气候、物候与农事节律。从历史看,二十四节气雏形可追溯至先秦,《吕氏春秋》有相关记载,《逸周书·时训解》细化物候描述,汉代《淮南子·天文训》有了完整体系。农耕文明生产逻辑是理解二十四节气的重要前提。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事活动依赖对时节的精准把握,节气谚语成为农业指南,嵌入乡村生活。这种自然与劳动结合的文化构成使得节气的体系能在农耕原始语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甚至脱离农耕语境也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广泛的传播力。二十四节气在民俗文化的深厚底蕴中与众多的传统习俗交织融合,赋予生活以深厚的仪式感,将清明扫墓、冬至吃饺子等一系列节气所带来的生活体验与文化记忆相融合,能更好地将相关

精神和意义植入生活中。节气文化还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意象资源和深刻的情感触点,将古老节气意象与现代新审美表达相融合,有助于人们在感受节气文化的同时体会作者的真挚感情。

节气之变：二十四节气在当代语境中的转化路径

二十四节气进入现代社会经历的转化过程,是挑战也是文化的自我更新。在相关文化政策推动下,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門出台保护规划,将其纳入相关体系,为传播提供制度支撑。各地围绕节气举办活动,强化价值认同,进一步唤起公众的关注与兴趣。数字媒介兴起为节气文化传播提供新路径。社交媒体上节气相关内容在节气交替时迎来传播高峰,大量优质内容广泛流传。这种传播体现了节气文化的亲和力和,促使其更新迭代。与此同时,如何避免碎片化风险,如何平衡传播效率与文化深度是节气文化传承的重要课题。在文创产业,节气元素广泛用于多维度的创新,形成创意实践。文化机构推出的节气文创产品结合节气意象与现代设计,为传统文化转化提供样本,表明节气文化能兼容现代经济逻辑,实现文化与经济价值双增长。

节气之魂：二十四节气的多维文化内涵

二十四节气深厚的文化生命力不仅体现了其对农业生产的深刻实用功能,更体现了其多维的文化内涵,其是对传统时间刻度的继承和延续,也将情感载体、民俗脉络、审美表达、地方生活智慧和人文关怀都融于其中,充分体现了民间文化的生动活力和独特的地域性。深厚多层次的文化构成使得节气的体系能在农耕原始语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甚至脱离农耕语境也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广泛的传播力。二十四节气在民俗文化的深厚底蕴中与众多的传统习俗交织融合,赋予生活以深厚的仪式感,将清明扫墓、冬至吃饺子等一系列节气所带来的生活体验与文化记忆相融合,能更好地将相关

精神和意义植入生活中。节气文化还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意象资源和深刻的情感触点,将古老节气意象与现代新审美表达相融合,有助于人们在感受节气文化的同时体会作者的真挚感情。

节气之变：二十四节气在当代语境中的转化路径

二十四节气进入现代社会经历的转化过程,是挑战也是文化的自我更新。在相关文化政策推动下,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門出台保护规划,将其纳入相关体系,为传播提供制度支撑。各地围绕节气举办活动,强化价值认同,进一步唤起公众的关注与兴趣。数字媒介兴起为节气文化传播提供新路径。社交媒体上节气相关内容在节气交替时迎来传播高峰,大量优质内容广泛流传。这种传播体现了节气文化的亲和力和,促使其更新迭代。与此同时,如何避免碎片化风险,如何平衡传播效率与文化深度是节气文化传承的重要课题。在文创产业,节气元素广泛用于多维度的创新,形成创意实践。文化机构推出的节气文创产品结合节气意象与现代设计,为传统文化转化提供样本,表明节气文化能兼容现代经济逻辑,实现文化与经济价值双增长。

节气之续：二十四节气文化生命力的内在机制与世界价值

探讨二十四节气的文化生命力,不能仅描述传播现象,还需要揭示其持续生长的内在机制。该机制的形成,源于节气文化本身的结构性优

势、中华文明的文化传播能力,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外部契机。

从内在结构看,二十四节气高度开放包容,这是其文化生命力持续更新的重要原因。它是可以叠加新内涵、容纳新实践的文化框架,不同时期的人能在其中注入不同的时代元素,实现文化意义的动态再生产。从社会传承机制看,节气文化的延续依赖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比如,学术界提供知识与理论,民间社区提供活态传承土壤,文创产业赋予其新生命形式,这种传承结构使节气文化有很强的抗风险能力。从世界价值维度看,二十四节气承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时间智慧,在全球生态危机与文明对话背景下,有超越地域和民族的普遍意义,与当代可持续发展理念价值共振。作为中华文明贡献的时间哲学,它为全球多元文化体系提供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视角。

二十四节气从农耕文明的时间坐标演变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珍视的文化遗产,这证明了其文化生命力。其文化生命力体现在节气文化中的自然哲学根基、对时代变迁敏感并主动回应、在传统与当代间构建对话关系等。展望未来,二十四节气文化传承不应仅作符号化展示,而要激活其对当代人生命体验的深层滋养,让节气成为现代人感知自然的活态智慧,在文明互鉴中绽放中华文化独特光影。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文明互鉴视域下陕西非遗译介与传播研究

刘红见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广泛开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加强多层次文明对话,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非遗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陕西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在文明互鉴的背景下,陕西非遗的精准译介与有效传播,既是推动陕西文化强省建设的举措,也是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要求。

陕西非遗译介传播现状

文明互鉴视域下非遗译介传播绝非单向度的文化输出,而是不同文明基于平等尊重的对话与共鸣。陕西非遗蕴含鲜明的民族特征、独特的文化价值、丰富的表现形态,既是地域文化的具象化表达,也是中华文化的浓缩,其文化内涵与世界各国文明中的人文追求、价值理念存在很多共通之处。

近年来,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深入推进,陕西非遗译介与传播效果取得一定成效。在译介实践上,高校与非遗保护机构重视非遗对外翻译研究,比如秦腔、剪纸等重点非遗项目已开展双语译介实践。在传播实践上,政府部门不断加强非遗保护和平台建设,通过国际文化节、非遗展演等活动推动陕西非遗“走出去”。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与非遗传播有机融合,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等新兴数字媒介传播模式增强了海

外受众对陕西非遗的关注。然而,从文明互鉴的视角看,陕西非遗译介传播仍存在一定困境。首先,译介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部分译介内容存在一定的文化折扣。当前,部分非遗对外传播文本存在术语译法不统一、文化专有项翻译不够规范等问题,导致相应文化内涵传递不足。其次,非遗对外传播叙事模式相对单一,部分传播内容的国际阐释能力存在一定不足。传播多以技艺展示为主,叙事模式相对固化,一些叙事模式难以契合海外受众的审美偏好,一些传播内容较少结合海外受众文化背景,对陕西非遗与世界文化的共性挖掘不足。最后,部分非遗对外传播媒介融合深度不足,数字传播能力较弱。尽管借助了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但因部分传播内容缺乏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以及数字非遗展等多模态内容,海外文化传播能力偏弱,难以实现精准传播。

文明互鉴视域下陕西非遗译介传播的优化路径

提升非遗译介水平,实现文化精准传递。可由政府牵头,联合高校、非遗保护中心、海外汉学家,组建陕西非遗译介相关机构,针对不同门类非遗的特点,制定专属译介标准,规范译介行为,建设陕西非遗术语库,规范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同时,深化文化内涵译介,结合陕西地域文化特色,深度挖掘非遗背后的历史典故、民俗风情与精神内涵,进一步实现文化内涵与国际受众审美的适配。

创新传播叙事模式,搭建文明对话桥梁。文明互鉴离不开情感共鸣,这就需要突破传统叙事模式,构建和完善故事化、国际化、共情化的原创叙事体系。挖掘叙事内容,丰富和完善叙事模式。深挖非遗背后的传承故事、工匠故事与时代故事,这有助于引发海外受众情感共鸣。创新叙事视角,实现“双向共情”。立足文明互鉴视角,摒弃“单向输出”思维,挖掘陕西非遗与世界文化的共性元素,比如从秦腔的苍烈到皮影戏的光影叙事、耀州瓷的东方美学,以人文情怀贯穿译介传播全程,使每一项非遗都以“文化可读、精神可感”的方式呈现。推动叙事主体多元化,形成协同发展格局。构建“政府引导、高校创作、企业推广、传承人参与”的多元化叙事主体体系,其中,政府搭建跨文化交流平台,高校聚焦叙事内容原创,企业推动叙事成果市场化传播,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亲身经历讲述非遗故事,形成多方协同的叙事合力。

创新媒介融合路径,构建多元传播体系。依托数字技术,拓宽陕西非遗译介传播的渠道。突破图片、文字等静态传播,开发增强现实、虚拟现实非遗体验项目,制作原创双语纪录片,让海外受众通过增强现实技术体验非遗制作过程;重点支持非遗数字展馆、智慧旅游平台等项目建设,以技术优势推动陕西非遗“出圈”。打造多模态传播内容,提升传播效能。推出“非遗+游戏”“非遗+短剧”等创

新内容,提升传播的趣味性。构建精准化传播矩阵,实现精准传播。结合海外受众画像,针对不同受众的偏好,制定差异化传播策略,整合多语言译介资源、数字非遗资源,实现非遗资源全球共享。

建立文明对话机制,深化文明互鉴内涵。在文明互鉴背景下,陕西非遗对外传播不能只停留在文化展示层面,还应重视与海外受众的交流互动。可结合海外媒体和文化交流活动,及时了解不同国家受众的关注重点,并根据反馈调整传播内容和表达方式。通过增强互动体验,引导海外受众更直观地感受到陕西非遗的魅力,进一步增进彼此理解,推动双向文化交流,实现互学互鉴。比如,推出非遗研学旅行、手作体验工坊等,设计多层次参与机制,增强受众的互动性和获得感。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互鉴给陕西非遗译介与传播带来了新的思路,我们需要从非遗译介水平提升、传播叙事模式创新、媒介融合路径重构、文明对话机制建立等方面持续改进,推动陕西非遗译介与传播,助力陕西文化强省建设,让陕西非遗成为推动文明互鉴、彰显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力量,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贡献陕西力量。

【作者单位：西安翻译学院。本文系2026年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秦岭(终南)文化重大研究项目“文明互鉴视域下秦岭非物质文化遗产译介与传播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2026HZ0998】

理论·专题7

官箴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劝诫、规训、引领官员正确地修身理政、治国安民为目的,其内容涵盖品德修养、行政伦理、地方管理、法规规范与治理经验等多方面内容,是古代吏治思想与国家治理智慧的集中体现。深入挖掘其文化精髓,辩证地汲取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对于当代干部的政德培育、治理能力提升、政治生态及廉政风气建构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官箴的生成与演变

官箴的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其形式是一种特定体例的文体,内涵为“官箴王阙”,即官员以箴文形式规谏君主。典型代表是《虞人之箴》,它以四言韵文为载体,短小精悍、重在讽喻,旨在劝诫君主节制游乐、勤于政务。

秦汉至魏晋是官箴的多元发展期。这一时期的作品打破了先秦官箴的传统,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格局。比如秦代的《为吏之道》,以直白凝练的语言,标明官吏从政的准则与行为规范。到了汉代,扬雄等人效仿《虞人之箴》的传统体例创作《百官箴》,延续了先秦“官箴王阙”的内核,立足百官视角针砭朝政、劝谏君主。发展至魏晋,民间及官员自用的私箴逐渐兴起,多用于官员自我反省、修身律己。自此,面向君王劝谏的官方箴文日渐减少,自省修身的私箴不断增多,这一转变极大拓宽了官箴的内涵与应用边界。

隋唐是官箴的重要转型期,“为官之戒”逐渐成为官箴的主要含义。武则天时期编纂的《百僚新诫》《臣轨》,着重强调官吏忠君报国、清正廉洁、秉公办事的基本职业素养,为百官履职树立行为标准。五代后蜀君主孟昶亲自撰写官箴文书,其中的“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箴言,直击为官初心与从政底线,流传后世,成为历代官员恪守的从政准则与修身信条。

宋元是官箴的成型期,这一时期的作品在“为官之戒”理念的指导下,进一步将官箴的内容从宏观的道德劝诫延伸至具体的政务操作层面。《作邑自箴》《昼宵绪论》《官箴》《三事忠告》等名篇问世,内容涵盖了地方治理的方方面面,并进一步确立了“清、慎、勤”等官箴重要准则,标志着官箴文化理论体系基本形成。

明清是官箴的成熟期。明代官箴在承袭宋元“清、慎、勤”重要准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民本思想。清代官箴则强调将儒家的仁爱理念与具体行政实践深度融合,比如陈宏谋的《从政遗规》收录了历代官箴精华并加以注解,引导官员在日常政务中践行道德准则。这一时期的官箴吸收了前代官箴文化成果,形成了集思想理念、行为规范、实践方法于一体的完整体系,成为古代王朝塑造官场文化、澄清吏治的重要手段。

中国古代官箴的文化意蕴

中国古代官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政治领域的集中映射,是古代政治伦理与治理智慧的有机统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

修身立德的道德意蕴,彰显官员从政的立身之本。古代官箴植根于儒家伦理,以修身立德作为官员从政之本,深谙“为政以德”的传统治理智慧。比如有官箴认为,作为直面百姓的“亲民之官”,其德行操守不仅关乎个人仕途沉浮,更攸关社会民生与国家安危。因此,古代官箴一般要求官员恪守操守,认为这是为政立身之本。比如《州县事宜》中提出:“盖操守者,出仕之根柢,必于此立稳,则事功、经济由此而起”。具体而言,其内涵可概括为“清、慎、勤”等字,其中“清”是操守的重要起点,“慎”能够规避施政疏漏,“勤”可防范吏弊蒙蔽。为官者当砥砺气节、严守底线,以高洁操守安身立命,不为外物所扰、不为歪风所惑,如此才能有效治理地方。

以民为本的政治意蕴,体现治国理政的价值导向。古代官箴以儒家民本思想为根基,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准则,形成重民、爱民、恤民的治理传统,深刻彰显传统治国理政的价值导向。首先,有官箴认为,民众是国家根基,民心向背直接决定国家兴衰与政权安危,因此要求为政者把凝聚民心、安定民生作为施政的首要前提。其次,有官箴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强调治理须顺应民意、因利利民,坚持“民之所好者,民之所恶者”,以造福百姓、普惠民生为政绩标尺,以百姓安危冷暖检验施政得失,把民心向背作为治理成效的重要依据,严禁苛政虐民、欺民扰民、与民争利,进一步确立以民为本的评价体系。

秉公用权的治理意蕴,明确权力运行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不少官箴将秉公用权视为从政要义,深刻阐明了公正用权、依规用权、为民用权的治理意蕴,为权力的运行确立了明确的准则。首先,有官箴认为,为官者须坚守公心、去除私欲,把秉公作为权力运行的重要准则,杜绝以权谋私、徇私枉法。其次,权力运行须守中正、去偏颇,不以亲疏远近断是非,不以个人好恶定取舍。比如唐太宗强调“为政莫若至公”,陈宏谋主张“中者,立法之本”,均指向用权须

中国古代官箴的文化意蕴与当代价值阐释

曲长海

坚守道义、不偏不倚,确保政令公允、法度得行。最后,秉公用权的本质是为民行权,以公正护民生,以公心保民利。官员须审慎用权,杜绝苛政扰民、贪腐害民,让权力运行始终服务于百姓福祉与地方安定。

经世致用的实践意蕴,凸显为官治世的务实精神。很多古代官箴深受经世实学思想浸润,将经世致用确立为为官治世的重要准则,强调学问与政事的合一、理念与实践的贯通,彰显出重实学、行实政、求实效的务实精神。首先,有官箴力倡学政合一,反对空谈义理、割裂学与仕,主张以儒家经术涵养治理实践,将经典义理转化为施政能力,实现“学以致用、政以显学”。其次,有官箴坚守崇实黜虚,摒弃虚文浮饰,强调内容据实可考、举措平实易行,要求施政切中时弊、惠及民生,坚决反对形式主义与表面文章,倡导为政者存实心、办实事、务实效。最后,有官箴以实效利民为旨归,将经世致用最终落脚于地方安定与民生福祉,主张催科中寓“抚”字、刑名中存“仁恕”,以保甲安民、以教化正俗,把治理实效体现在百姓安危冷暖之中。

中国古代官箴的当代价值

古代官箴凝聚了传统吏治智慧与治理经验,在干部教育、国家治理、政治生态、廉政建设等方面具有借鉴意义,可为当代政治建设与社会治理提供文化滋养。

一是为干部教育与政德建设提供理论借鉴。有古代官箴倡导“以经术而治吏”,主张将经典义理与为政实践相结合,融合传统政治治理与基层治理理念。官员通过不断正心修身、涵养为政德行,将道义准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转化为履职干事的实际能力。这一修身理政的传统思路,对当代干部综合素质培育极具借鉴价值。

二是为国家治理与实干作风提供实践借鉴。不少古代官箴秉持务实为政的导向,要求为官者心存实心、力行实政、务求实效,坚决摒弃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和各类政绩工程、表面工作。它强调施政举措必须贴合实际、直击时弊,真正惠及百姓民生。这种求真务实、力戒虚浮、实干兴治的治理精神,与当下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的工作要求高度契合,有助于引导干部深入基层一线、贴近群众生活,精准掌握民情民意,切实把各项政策落地落细,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三是为优化地方政治生态提供重要镜鉴。古代官箴往往结合具体制度环境与社会实际视为官理政之事,讲究因地制宜、因事施策。既重视以行政伦理约束官员言行,也正视基层治理中的各类现实难题,着重防范权力蒙蔽、权力滥用等治理风险。这种兼顾权力运行、人际协作、制度落实与民情反馈的系统性治理思维,能够帮助当代治理工作精准把握地方治理规律,助力营造风清气正、权责明晰、务实为民的良好政治生态。

四是为推进廉政建设与权力规范提供文化支撑。廉洁奉公、秉公用权是很多古代官箴的重要底线,其倡导戒贪守正、审慎用权、体恤民众,形成了道德自律约束与行为规范管控相辅相成的完整体系。其中蕴含的廉政思想和权力监督理念,有助于持续强化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为当代廉政建设提供深厚文化滋养,助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作者单位：湖北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